

# 香港傳真

(香港) 桑尼研究有限公司  
中國稅務雜誌社綜合研究組

No. 2011-54

2011年11月17日

\*\*\*\*\*

## 鄉土二割

北京大學中文系 韓毓海

舊作兩篇，分別涉及中國農村之歷史方面和當代方面。現檢出再思，請多識者指教。

### 一、“陶令不知何處去，桃花源裡可耕田？”

2005年6月28日，到鄭州。

剛住下，當地的同志就來問我們想去哪裡走走，我便說：要說最想去看的，那其實也就是南街村了。

東道主一時躊躇，沉吟了一下，婉言道：要說別人也就罷了，你們既然是搞研究的，若要真想瞭解南街，一兩天的時間，走馬觀花怕是不夠的。最好的辦法，我看是能找下個親戚住在村裡。——要說南

街這地方，無論你多有學問，起碼也得用個把星期，那或許才能摸出點門路來。

之所以想去南街村看看，並不是為了獵奇。這次到延安學習，某日夜間，陳錫文同志來講課，他的一句話令我印象深刻：“未來中國若出事，最有可能出在農村”。陳錫文還說：“如果聽任投機資本炒賣、剝奪農地，18 億畝耕地紅線必然就守不住，而這個世界上沒有人能夠幫助中國解決 13 億人的吃飯問題，何況，我們若將農村的老弱病殘棄之不顧，那還要馬克思主義幹什麼？還要中國革命幹什麼？還要中國共產黨幹什麼？”

此言既出，舉座無語，幾百人的會議室，頓時靜得宛如空穴。

會後議論，有人說起中原的南街小村，且與朱皇帝那討飯的故鄉作對比觀，言其諸種不妥當者，自然是有，但說它好的倒是也不少。的確，在農村基層組織大規模解體的條件下，南街的免費教育、合作醫療、同工同酬、五保制度，“外方內圓闖市場”，組織起來共同致富，聽起來似乎便是“不知有漢，無論魏晉”了；至於其歌聲嘹亮、五講四美、農民夜校，且幾十年埋頭堅持走自己“農村城市化”的道路，這小小南街村實在算是冒天下之大不韙，也真真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土圍子”了。

耳聽為虛，眼見為實；“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南街於我似乎永遠是個謎——大概還是當地的同志說得對，老百姓的智慧，並非是我們這些號稱知識分子的傢伙一朝一夕所能參透的。不跟農民一起攪它三年馬勺，恐怕去了也是瞎耽誤功夫，去了也是白去。

何況這次我們調研的時間不長，調研內容基本上也都屬“規定動作”，因此所謂“插空走走”也只能退而求其次。結果是客隨主便，最後選定了登封、洛陽走一遭，南街的事情，看來只好留待將來了。

南街沒去成，而在去洛陽的一路上，想起的故事，就是歷史上的

“塢”和現實中的“土圍子”之間的關係。其中涉及的一件舊事佳話，那就是陶淵明的《桃花源記》。

史上對陶淵明的評價，似乎以陸九淵說得最好，象山說淵明：不肯作“小人”，更不肯作“大人”（先生）；因為陶的理想是作“常人”、是守“平常心”。“既非以此要官職，只是利國利民處隨力行之，不敢必朝廷之從與事功之成——此真長者之本心也”。<sup>1</sup>

要做事而不要做官，要“利民”而不求事功政績，其中關鍵要害就在於“不跟風”（不敢必朝廷之從），這也就是淵明的“無為”處，即他的無為，是“不敢必朝廷之從與事功之成”，而並不是在家裡閑著打便宜拳、喝菊花茶養心。“我心即是民心，養我心即是養我民”，“只是利國利民處隨力行之”，這方才是淵明在《五柳先生傳》中推崇的“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實際上，這也就是所謂“不惟書，不惟上，只惟實”，而“惟實”，也就是與天下百姓“同心”，而這也就是陸象山所謂的“平常心”。

至於“塢”，則是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特色。它起源於所謂的“五胡亂華”時代，作為中原百姓組織起來、自我保護的方式，更有著約 1500 餘年的光榮傳統，而其寓言化的體現，正是膾炙人口的《桃花源記》。

這個話頭，牽扯中國農村制度變遷之本末，所以值得仔細道來。

東漢末年，貴族與豪族的大莊園連陌四起，大量失去土地的農民，便不得不歸附於大莊園而成為農奴，這便是所謂“部曲”。“部曲”與秦漢時代的“家奴”——即一般意義上的奴隸不同，家奴服務於主人的家政，而部曲的工作則是專門種地，且兼替主人服役——而服役，主要也就是打仗，故“部曲”的意思也就是部隊，不過是貴族豪族的私人部隊，是私兵而已。因此，中國歷史上的農奴制，是與私兵

---

<sup>1</sup> 《陸九淵集》，中華書局 1980 年，第 152 頁。

制相聯繫的。

貴族和豪族既有了莊園和武裝，也就有了彼此殺伐的資本，這便是東漢和魏晉天下大亂的根源。而為了在貴族與豪族彼此爭奪的夾縫裡鞏固政權，西晉的皇帝便“病急亂投醫”，不得不將原被曹操安置在并州（今山西太原附近）的匈奴後裔劉淵及其部落，召喚南下，充任對抗貴族和豪族勢力的工具，但匈奴後裔接到勤王命令後，卻自行建立了前漢政權，隨即便攻破西晉首都洛陽，西晉滅亡。此後，趙、燕、秦、代先後興起於山西、河北與關中，洛陽幾番城破，中原人口大量被徙往代北，而所徙者，其實也就是部曲，這自然是因為部曲既能開荒種地，又能打仗。

所以，從制度論的視野看去，“五胡亂華”作為制度變革的意義，其結果首先便是將中原的部曲——農奴制（即《商君書·農戰》篇的主體），平行移植到了“四夷”、播散到了四方，而“五胡”們藉此完成的，便是其自身由“部落制度”向農奴制度的轉化。

另一方面，在此一大動蕩中，中原的貴族與豪族，又不得不攜帶著大量的部曲，且戰且走，去遠方尋找新的落腳點，兩晉南北朝凡368年之大變動，故可以說是由人口的大流動、大遷徙所引起，所標誌。從全國範圍內看，北方人民流徙的方向有三：東北、西北和南方；流向東北的一支，匯合於鮮卑慕容氏政權下，此後誕生於東北地區的漢化政權：遼、金、元、清，追根溯源，就肇始於此；流向西北的一支，則歸依於涼州張軌的領域，隋唐兩大帝國，均以此為根據地崛起。流向南方的一支，起初僑寓於孫吳故壤，“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江南的開拓，便由此奠基。所謂“天下中國”的形成，其實是以大規模的農奴～部曲制度的普及到大江南北、長城內外為標誌，而它就肇始於魏晉南北朝以來的大規模人口流動。

一千多年前的中原人民，或者被遷徙，或者逃難而去，而還剩下

的那些“不能遠離本土遷至他鄉的，則自相糾合，屯聚堡塢，據險自守，以避戎狄寇盜之難。”——所謂“塢”的制度文化，從而產生；而一場根本性的社會制度大革命，也因此而醞釀。

說起“屯聚堡塢”的“塢”，其主要特點有三：一是百姓“自相糾合”，憑險而守，二是推舉精明能幹、有公心之塢主（堡壘戶主），建立集體組織；三是於內部實行同工同酬、互助合作的分配方式，此所謂“峻險厄、杜蹊徑、修壁塢、樹藩障、考功庸、計尺丈、均勞役、同有無”。上述這三條，都標誌著中國歷史上根本性的制度變革、制度革命：其一，所謂“自相糾合”，即不是賣身投靠作農奴，它說明“塢”是百姓的自組織，標誌著農民的自組織、集體組織第一次出現；其二，所謂“塢主”，更不是貴族、豪族，而是被眾人推舉出來的群眾領袖、帶頭人，他之所以被推舉，就是因為有“公心”，即能給眾人辦事，“大公無私”，特別是關鍵時刻能拿出自己的財物周濟眾人；其三，所謂“均勞役，同有無”，便是說開荒種田，積累公共財產，並在共同體中公平分配勞動成果。

一言以蔽之，所謂“塢”，乃是自由農民之集體組織的起源，當這種組織形式誕生之時，農奴～部曲制度就開始動搖，並逐步走向瓦解了；我個人的看法是：魏晉南北朝後期，塢的產生，乃是中國社會由農奴～部曲制度（役戶制度），向佃戶、農戶制度轉化的橋樑，若以理想言之，塢的制度，標誌著中國農民第一次自主地組織起來，並嘗試著自下而上地變革生產關係和社會關係，塢的形成，標誌著中國農民第一次成為中國社會變革和社會革命的主體。

“塢”字的原義，《後漢書·馬援傳》說是“小障也”，也就是小型的堤壩，也有解釋為“小城”的，而《馬援傳》所記，乃是隴西太守馬援為了防止羌族的侵犯而設置的“塢候”，也就是軍事防禦堡壘，永嘉之變發生後，人民為了避亂，利用天然要害之地形成供集團

居住的壁壘，《水經註》中說，百姓在洛水河畔構築的一合塢，高二十丈，南、北、東三面有天然絕壁，只將西面以人力堵住，此真所謂“山下旌旗在望，山頭鼓角相聞；敵軍圍困萬千重，我自巋然不動”。那時的北方，儘管到處都出現了塢，但尤以河南為多。《水經註·洛水篇》就記載：“洛水所經，堡塢林立”；而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河南嵩洛一帶，多有既險阻又可以耕種，且有泉水灌溉之地，正是自給自足，可以長久支持的理想地方。

中國的制度，起源於血緣氏族制（王國維所謂《殷周制度論》即是言此），繼之以中央集權的官僚制（所謂“百代都行秦法政”是也），而“自相糾合”、“推舉塢主”、“考功庸、計尺丈、均勞役、同有無”的農民集體自組織形式，則肇始於五胡亂華時代的“塢壘制度”，作為一種新制度的萌芽，後世所謂“農戶”者，其實就起源於“塢壘戶”，因為此前只有“役戶”，即承擔徭役的農奴，並沒有“農戶”這樣的說法；而“農戶”是對中古以來作為農奴和部曲的“役戶”的革命，塢壘組織，作為自下而上的自由民的自組織集體，乃是對血緣共同體和國家官僚制度的雙重超越；從此後，中國自下而上的農民革命，就不再是烏合之眾的“痞子運動”、不是立足於血緣關係的封建割據，也不是沒有身份的奴隸起義，而是有了自己的領導力量、組織形式、有明確的社會改造理想和目標，是具有獨立身份的農民團結起來、組織起來，以“集體”的力量，所不懈從事的改造中國社會的進步運動。

也正是敏感到塢壘制度意義重大，陳寅恪先生才在《桃花源記旁證》<sup>2</sup> 這篇名文中，通過綿密的考證斷定：《桃花源記》雖為寓意之文，卻是西晉末年以來塢壘生活的真實寫照。他考證說：東晉末年，隨從宋武帝劉裕遠征長安的戴延之，遵照劉裕的指示實地踏勘洛水上

---

<sup>2</sup> 原文載《清華學報》第11期。

游，因為無法到達水源而中途折返，其時他踏勘了百谷塢、檀山塢等，並且經過“桃源塢”這個地方，戴氏撰寫的踏勘記名為《西征記》，陶淵明正是取材於此而創作了著名的《桃花源記》；這也就是說：“桃源”本來實有其地，而非陶淵明的幻想，桃花源居民先世所避之“秦”，乃是掃平了北方，繼而發動淝水戰爭的氏族苻堅之“前秦”，而不是指秦始皇的秦。而真實的桃花源，應在中原文明發達之北方的弘農（靈寶）或上洛（洛陽）一線，而不可能在南方的武陵。

“舞榭歌臺，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寄奴”是宋武帝劉裕的小名，劉寄奴手下的戴延之，乃是第一個“遭遇”了中國農民的集體組織——桃花源，然而卻又迷途折返的人。陳寅恪寫《桃花源記旁證》時的感慨，未必比當年的辛棄疾要小，陳氏此論，更是歷史研究中一個非常的洞見，它揭示了中原文明何以能夠在戰亂中得以保護與延續，以及此變亂所導致制度創新之奧秘，儘管陳氏畢生，卻未必瞭解那一頭扎進了“桃花源”，從此便不再回顧折返的毛潤之的所思所想，他也不曾贊同毛所謂組織起來的農民集體，“什麼人間奇蹟都能創造”的論斷，如今想來，中國歷史上，遭遇“桃花源”而又迷途折返者，又何止戴延之一人？

我讀《桃花源記》，總是要陷入中國歷史上知識分子（過去叫士大夫）如何與農民相結合這個話題而不能自己。在我看來，第一個對農民的自組織集體頂禮膜拜，大加讚美者就是陶淵明，而不是後世的丁玲、柳青、趙樹理，陶淵明大概是第一個希望一頭扎進農民堆裡，從此再不願“出山”的中國士大夫，從此後，陸象山、王陽明、顧炎武，乃至清季世的曾、胡、左、李，都將作“塢主”（即鄉里共同體領袖），當作一時之理想，大而言之，“上山下鄉”還是“下山進城”，從此便成為一千多年來中國讀書人的艱難選擇，只有知識分子深入農民之中，才能改造中國，而洞悉此道的集大成者，自然就是毛澤東。

宋代以來，朝廷治理士大夫的辦法就是讓他們當官，對士大夫而言這也就叫做“出山”，朝廷的辦法自然是利誘，說是利誘，辦法其實簡單，說白了，就類似於今天的“考級”，也就是朝廷制定一套考試標準來選拔士大夫，這個標準便是所謂“文法”，從此後，士大夫所學者便是“文法”，而非聖賢之道，王安石所謂“文法害聖賢之道”，後世光緒帝所謂“中國之弱，在於積習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說的都是這個意思。

“出山”便是士大夫脫離農民群眾的開始，而朱熹、陸九淵們想出的反抗科舉與文法的辦法，便是“上山”，這也就是在山上開書院講學，以與朝廷之“文法取士”的考級招安相對抗。“士大夫上山下鄉”的靈感，源遠流長，其源頭也便是來自農民的塢壘和塢壁的傳統，因為宋代的書院也叫原塢。

原塢、書院，作為士大夫的自組織，其實是從農民那裡學來的。

鄉人彭世昌得一山，在信之西境，距敝廬兩舍而近，實龍虎山之宗。鉅陵特起，迺然如象，名曰象山。山間自為原塢，良田清池，無異平野……往歲彭子結一廬以相延，某自為精舍於其側。春間攜一侄二息，讀書其上……學子稍稍結茅其傍，相從講習，此理為之日明，舞雩詠歸，千載同樂。<sup>3</sup>

這裡說到的，就是知識的共同體與農民共同體之間的關係，是書院與塢壘之間的關係。

實際上，自魏晉以來，農民的自組織推舉出來的塢主中，不少便是讀書人和士大夫，從東晉的庾袞，直到被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大肆謳歌的明代書生李岩，他們都是這樣的讀書人塢主，他們的行為，可以說是以開倉賑濟、平民教育為職責，以“替天行道”為目的，

---

<sup>3</sup> 《陸九淵集》，中華書局 1980 年，第 23 頁。



用今天的話來說，他們就是知識分子與農民群眾相結合的模範，是“上山下鄉”的楷模。

由於有了讀書人的加入，塢的功能便不僅僅是生產和軍事自守，因為民衆教育成為塢的一個重要功能、基本特點，它尤其表現在：塢的治理理想，不是刑名和利誘，而是思想教育，它主張待共同體的成員如“學生”、如“子弟”，而不是如“百姓”，大而言之，它昭示著中國兩條政治路線的分野，一條“官僚”對“百姓”，一條“鄉里”對“子弟”、“老師”對“學生”，而只有後一條線，即只有以百姓為“父老”，方才能夠帶出了“子弟兵”，只有“老師”對“學生”，才能培養真君子。而這種治理依靠的，自然是文化和信仰，它所針對的是共同體成員的“心”，而不是“身”，所以，它主張用做學問的方式搞治理，主張讀書與治理不可分為兩事，這便是“一邊打仗、一邊生產，一邊讀書”，這便是“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這便是“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聖賢只一個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二事”。極而言之，它強調政治工作的辦法與搞學問無異，根本上均在於“調查研究”、“實事求是”，因此提倡用開會和思想教育的方式解決群眾問題，通過“批評與自我批評”，造成“必也使其無訟乎”這樣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

若說遠點——這也就是“三代之治”的理想。

三代尤遠，魏晉也不近，而我們所知道的，是毛澤東書裡寫到的那些鮮活的主張、那些古老而年青的語句，以及共產黨當年在陝甘寧、太行山的實踐。它表明：三代之制沒有那麼遙遠，也沒有那麼玄乎，古人、古制並非一種敘事，所謂的“現代”、“後現代”，所謂的“西方正典”，才是今人手造的莫名其妙的“大敘事”。

宮崎市定的名言是：以為毛澤東憑一個人的天才就改變了中國，這是因為人們不瞭解毛澤東是站在了中國多少聖賢的肩膀上。毛澤東

的偉大，不過是他使得中國道路得以延續，並發揚光大。

近代以來的中國道路，既不落後於西方，當然也沒有超越西方，因為中國只是走在自己的道路上。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將來必然還是如此。

瀏陽河，轉過了幾道灣，幾十里水路到湘江？江邊有個什麼縣，出了個什麼人，領導人民得解放？

其實，近代湖南，倒是出了兩個潤之（芝），一個自然是毛潤之，另一個乃是曾、胡、左、李的中堅——胡潤芝（林翼）。且有“澤東”，亦有“澤南”。錢鍾書的父親錢基博先生《近百年湖南學風》講湘軍及其創始人羅澤南，他以為湖南學風之要害，全在“以思想建軍”，“以學問治世”，而其關鍵，一言以蔽之，就在於知識分子、讀書人與工農兵相結合：

或問（澤南）制敵之道，曰：“無他，熟讀《大學》‘知止而後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數語，盡之矣。《左氏》‘再衰三竭’之語，其註腳也。”亦本周敦頤主靜察機之說。其治軍以不擾民為本。視東南安危，民生怨苦，如饑溺在己，與其所註《西銘》相符。軍行所至，士民歡騰，或輸敵情，或訴所欲，饋肉餉飯，如家人父子，得道多助，屢破大敵，而善以寡擊眾。眾人化之，荷戈從軍，蔚然成風。時為之語曰：“無湘鄉，不成軍”。藉藉人口，而不知無澤南，無湘軍。惟澤南以宋儒之理學治兵，以兵衛民，皎然不欺其志。此湘軍所以為天下雄，而國人歸頌焉。倘好馳馬試劍，漫事以從軍攫富貴，豪閥裡，而不體澤南之以宋儒理學治兵，以兵衛民之指，意氣自雄，是則澤南之志荒，而湘之所以為勇者亦耗矣。自來言宋儒理學，往往小廉曲謹，可以持當躬，而不足以任大事。顧澤南義勇奮發，本之間學。朝出鏖兵，暮歸講道。中間屢遭慘敗，而志不撓，氣益壯，討部眾而申傲之，

或解說《周易》以自遣云。<sup>4</sup>

錢基博先生很以莊存與、劉逢祿這樣的同鄉自豪，因為無錫乃是經世致用的“今文經學”的故鄉，按照他的思路，近代中國經世學統開於江蘇，而成於湖南，《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其實便是以朱子語錄治軍的典範。這話聽起來荒唐，但深思之，卻絕非沒有道理。尤其是他指出，宋儒的缺點，便是將學問與讀書考試相結合，從而墮入“小廉曲謹，以持當躬”，而惟有將學問與保家衛國相結合，只有知識和知識分子與人民相結合，方才可以上馬殺敵，下馬讀書，朝出鏖兵，暮歸講道，方才足以“任大事”、成大事。

在我們這個世界上，中國人口最多，最多的人口就在農村，這原是最簡單的事實；只有把農村搞好了，中國才能好，只有農村出人才，中國才能出人才，只有農村強大起來，中國才能強大，這本是最明白淺顯的道理，而處心積慮地要使農村弱下去、垮下去，以便靠壓迫、掠奪農村、靠欺騙大多數人而謀一小部分人的“發展”，損不足以奉有餘，這有違天道自然，朱子當年說宋代的發展道路違反“天理”，這並不是沒有根由的。

唐中期，楊炎行“兩税法”，役法從此正式瓦解，役戶從此正式成為以稅代役的“農戶”，而歷史關鍵更在於，基層里保制度亦從此變質。

唐宋之間，中國基層十戶為保，十保為里，里保長本是鄉里公推、輪流擔任的“民衆召集人”，但自“兩税法”行，里保長均由富戶、大戶擔任，這自然是為了稅收的保證與方便，但是，如此以來，里保長便由公推或輪流擔任的基層民衆召集人，變成包攬國家稅收的胥吏，宋、明、清之制，官不久任，官其實不管基層的事，基層的事權，

---

<sup>4</sup> 錢基博：《近百年湖南學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4 年，第 21~22 頁。

從此操縱在胥吏手中，所謂“官無封建、吏有封建，皆實指也”。胥吏成為魚肉鄉里的黑社會勢力（土豪劣紳、贏利型經紀），中國基層從此陷入群龍無首、一盤散沙的狀態，基層組織、農村集體，至此全面瓦解。宋、明、清之弊，首在於基層無組織，國家能力無法深入基層，中國近代之落伍之根底，也實在於此。

而且，即使沒有朝廷政策的強制，隨著運河沿線城市的興盛和大商人集團的崛起，塢壘這種農民的“小城”，必然也要伴隨著農村整體一起衰落。組織的瓦解、貨幣的短缺、與外部市場的隔絕，都足以置鄉里集體於死地。

現代以來，中國學術界為了模仿、追隨西洋道路，鑽牛角尖般地在中國歷史中尋找“資本主義萌芽”，而結論，其實原本早就擺在那裡：宋、明、清的制度設計本身，便是以弱化、分化農村為指歸，在這樣的制度框架下，從中國基層農村，就絕不能自動長出西洋那種“資本主義”和“市民社會”。這裡的原因是：無論江南和沿運地區發展出多麼龐大的、以紡織業為核心的農村家庭手工業，但是，由於“市場”和“投資”都在外部，尤其是自明隆慶以來，大規模地進口白銀並依賴海外市場，在由大商人和地方胥吏所壟斷的層層“轉包”的產業鏈條中，基層手工業者、分散的“農戶”、“織戶”處於產業鏈條的最末端，處於被剝削壓榨的最底層，他們在“資金”與“市場”這兩方面都徹底喪失了自主性，從而不得不依賴於外部的城市、大商人——隨後就是買辦商人和承包商。

一缺乏資金、二缺乏內部市場，三沒有農民自己的組織；既然不能組織起來，也便沒有公共積累，這是中國基層手工業不能向產業化、工業化和城市化進步根源，五百年來，中國基層農村在資金、市場、組織方面，均是被制度性打壓、分化、瓦解的對象，是被掠奪的對象，這便是中國基層共同體瓦解的根源，這便是中國近代衰落的根源。

“一篇讀罷頭飛雪”。讀中國史，最大的感慨就是農村基層組織的自我修復能力之強，是脫胎於塢壘傳統的中國的基層共同體，如何在艱難困苦中依舊成為支撐中國改革與革命的根本力量這個動人的事實。

清兵入關，所遭遇的最根本抵抗不是明軍和李自成，而是塢壘為代表的基層民衆：“時開封、汝寧間列寨數百。劉洪起長之；南陽列寨數十，蕭應訓長之；洛陽列寨亦數十，李際遇長之。各擁兵四五萬，而洪起最勇……惟劉洪起力戰汝寧間，及七月，始為內大臣和洛輝所破斬。”<sup>5</sup> 同光之間，內憂外患，在日益臨近的“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曾、胡、左、李率領湖南子弟兵起於鄉里，成為“中興”的基石。直至盧溝橋角聲連天，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東南沿海城市一朝盡失，惟有中國共產黨人振奮於陝北，興起於太行，所以能夠再造中國者，就在中國共產黨人實現了中國優秀知識分子與最基層農民群衆的緊密結合，就在於中國共產黨人在山窮水盡之際，能夠義無反顧的“上山下鄉”，如此，方從中國最基層將民衆組織起來，從中國最基層加強了中國的國家能力，中國革命勝利的道理，無非是倒轉了宋、明、清持續四百餘年來，弱化基層、分化基層、剝奪農村的發展道路，它更證明了一個樸素的真理：農村強則國強，基層固則國興。

“要把農村建設好，建設得和城市一樣好”，“中國有 11 億人口，如果十分之一富裕，就是一億人富裕，相應地有九億人擺脫不了貧困，就不能不革命啊！”斯聖人言也，斯天理也。天理俱在，何不存天理，滅人慾？所謂“存天理者”，便是建立農村基層金融服務體系，使投資向農村傾斜，就是建立植根於農村的內需市場，就是建立和壯大農村基層組織。與民同心，斯為大同，知識分子與農民相結合，

---

<sup>5</sup> 魏源：《聖武記》，岳麓書社 2011 年，第 40 頁。

到基層去，到人民中去，拜人民群眾為師，作他們的知心人，乃至學著作他們的組織者和共同富裕的帶頭人，這便是與民同心，斯為大道，是人間正道。

當世知識賢達、社會精英，每以“士”自詡，實則往往為功利、私慾鬼迷心竅，大人先生其志，功利小人其心、其實，獨獨喪失了常識感、平常心。若非鬼迷心竅，喪失常心，何以捨本逐末，捨大道而就歧路？何以棄常理而就邪說？“三代”遠矣，“塢壘”遠矣，“人民公社”遠矣，“共同富裕”亦遠乎？捨本逐末，捨道逐術，雖聖人再世，吾知此道不能復起也。

此非勢也，非命也，是不知大勢，是不知天命也。

## 二、春風到處說柳青

1951年5月，《中國青年報》創辦者之一，編委、副刊主編劉蘊華（柳青）毅然離開了首都北京，自己帶著簡單的行李，踏著最後一場瀟瀟春雨中的泥濘路，來到陝西省長安縣的皇甫鄉安家落戶，直到1967年被強行“趕走”，這位曾經的“團中央高級幹部”在鎬河畔神禾原上的古廟裡，像一個農民一樣住了14年。

“腳上穿著爛皮鞋，褲腿上滿是泥點子，手裡拿著哮喘噴霧器，沒日沒夜在村裡和田裡轉”，柳青給皇甫鄉人留下的印象，使人想起他同時代的另一個傳奇人物：1950年代，古巴革命者切·格瓦拉捨棄了在古巴青年團和中央銀行的領導職位，悄然離開哈瓦那，奔向艱苦的叢林游擊戰，在一個也許並不適合他肉體生存的地方，去身體力行地打擊世界上最野蠻的獨裁者。——而巧合的是，柳青與格瓦拉患有同樣的疾病：嚴重的哮喘，他們甚至都要依靠哮喘噴霧器才能維持日常生活。

著名的“梁生寶買稻種”的故事其實就來自柳青本人。1956年，柳青用自己的稿費和積蓄換來了日本良種稻——矮桿粳稻，在小範圍種植試驗成功之後，第二年秋天，王家斌（梁生寶的原型）勝利合作社的一千多畝水稻獲得了平均畝產710斤的大豐收，創造了陝西地區歷史上最高的糧食生產紀錄。1960年，長篇小說《創業史》第一部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前的一個月，柳青就將全數的稿費16065元，捐給勝利人民公社，作為公社的工業基建費用，公社用這筆“鉅款”修了一座農業機械廠，後來又建了王曲衛生院。為給村裡拉電線，柳青更預支了小說第二部的部分稿費（《創業史》原計劃寫四部），於是柳青的後半生幾乎就是在債務中渡過的，像一切苦行者一樣，這個當代中國“發行量”最高的作家之一去世時很可能一貧如洗，他盛年而逝，並不長壽（終年62歲）。

“往事並不如煙”。“梁生寶買稻種”的故事自然也不絕如縷。1990年代末，為了支持中國包產到戶的典型安徽鳳陽小崗村，日本駐上海總領事代表日方向小崗村投資一千萬日元，用於引進優質稻種，以改變小崗村農戶自1980年代後期以來糧食產量長期徘徊不前的局面（據陳窗、曾德方《小崗農民訪談錄》披露：2002年小崗遇到旱災，許多家庭承包田的畝產降到200斤），與柳青的故事相似——稻種還是日本稻種，但是，此時的小崗村卻遇到了當年《創業史》開頭所描寫的“蛤蟆灘式困境”：由於村裡早已沒有集體農田，更沒有一個王家斌式的村幹部願意將自家的田用來試驗新稻種，沒有一個“梁生寶”自願吃虧充當第一個吃螃蟹的人，結果優質稻種因為無地試驗而無法推廣，一千萬日元投資自然打了水漂。1990年代末，一千萬日元不過65萬人民幣，而在1960年代初，一、二兩部《創業史》的稿費卻遠不止今天的三百萬人民幣，在當時的農村，幾乎就可以開銀行了。

2006年，孟加拉國銀行家穆罕默德·尤努斯因為長期從事反貧困事業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其獲獎理由不過是：他長期向窮人提供小額貸款（每筆20美元），只是不要抵押而已（實際上，窮人除了自己身上的一張皮之外，實無長物可以抵押），而至於“利息”，慈善家們似乎總還是要收的，與尤努斯博士這種“慈善家”不同，柳青的事業更真實地屬於千千萬萬人，可以毫無疑問地說，他所作所為比尤努斯要徹底得多。

### （一）歷史、階級與異化

正如“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不能從當下——而應該從1949年算起一樣，中國當代文學“走向世界”的歷史，也不能從1980年代、更不能從“當下”算起。例如，1964年新日本出版社就翻譯出版了《創業史》上下兩部，這也是迄今為止最完整的《創業史》版本（因為中國國內只出版了《創業史》的第一部）。日本著名學者岡田英樹在《野草》雜誌評論說：“《創業史》確實把中國長篇小說的已有水平引向一個新階段”，日本讀者“為其直視現實的敏銳目光而驚訝，為其生動的人物形象而興奮，被作者對未來充滿堅定信念的描寫而征服。”

1978年，《創業史》英文本出版，柳青臨終前在病床上翻看的書，就包括這本英文《創業史》。諷刺性的是：儘管1980年代開始了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的時代，而“當下”的中國作家能夠閱讀、翻譯和運用外文寫作者，卻始終寥寥無幾（張承志可以用日文寫作，也許是唯一的例外），當下的中國作家其實是靠穆旦等翻譯家的語言來完成他們對於西方文學大師的崇拜的，而可以肯定的是，迄今為止，當代中國小說家可以熟讀英文原著的，其實是三個最土的“農村題材作



家”：柳青、趙樹理和韓少功。

或許，當下的人們也已經忘記，所謂“中國人放歌維也納金色大廳”的歷史，並非從宋祖英等“走向世界的藝術家”開始。因為早在1951年，中國歌劇《白毛女》就轟動了維也納（並不是靠使館送票，動員、組織當地華僑來捧場），而在柏林和德累斯頓，當年喜兒的扮演者王昆，幾乎被歌劇之鄉歐洲觀眾熱情的鮮花所掩埋，謝幕的時候根本無法下臺。今天熱衷於引進“西洋大歌劇工程”的人們也許不知道，芭蕾舞劇《白毛女》至今依舊是世界上頂尖芭蕾舞團的保留節目（例如著名的日本松山芭蕾舞團），至今在世界各地（除中國大陸外）巡演，長演不衰。

被“當下”遺忘的當代中國作家丁玲、柳青、趙樹理，他們的世界影響首先是因為其對現代性的深刻理解，對現代小說藝術的創新。普林斯頓大學的嚴海蓉和康乃爾大學的顏海平教授曾分別指出：《創業史》和《太陽照在桑乾河上》的突出成就在於“心理描寫”，它使得中國農民從此成為有了豐富內心活動、內心矛盾和靈魂鬥爭的“現代人”，中國農民的階級主體性，就是在這種精神的自我矛盾中建立起來的。正是這種心理描寫，揭示了在中國革命中，農民的“內在主體性”逐步確立的過程，它揭示了農民在現代革命條件下靈魂的“自我分裂”，同時更揭示了：正是在克服這種分裂的過程中，中國農民方才逐步形成了集體意識、國家意識和新文化信仰。比起獲得土地和物質上的“翻身”，這種主體意識確立的歷史，則是漫長的中國革命的另一個重要遺產。

實際上，《創業史》有兩條線：一條是具體的“創業”歷程，一條是農民的“階級主體性”形成的歷程，這兩條線互相促進、互相轉化，方才構成了柳青《創業史》的敘事風格。

小說主人公梁生寶，從個人意識走向集體意識，其階級主體性形

成的動力，始終是“創業”、“置業”的現實物質追求，而並不是抽象的精神活動。正是在“置業”這個物質目標的驅動下，在“創業”這種物質生產活動中，在創業、置業的挫折中，主人公由“個人創業發家”的失敗，逐步走向“集體創業發家”的覺醒。

通過這樣彼此交織的兩條線，作家要揭示的是“以物質生產活動為基礎和動力的農民精神蛻變”，而這就是作家的“辯證唯物主義”視野：一方面，離開了現實中的創業歷程，梁生寶與“蛤蟆灘”農民精神和思想的變化就沒有了依據，他們也就成為了“高大全”，他們的故事，也便成為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所謂——戴著階級標籤的“假面舞會”，而其實質終歸還是“一堆馬鈴薯一般的小農”，一旦曲終人散，卸下階級標籤、面具，他們依然還是一盤散沙的舊式小農；而反過來說，離開了在創業道路上精神的蛻變和昇華，離開了階級意識的產生，《創業史》也就成了傳統中國的田園詩，在那裡則沒有具有內在深度的人、沒有具有主體性、主動性的人，而只有“自然人”。

《創業史》的主要成就，當然還是在後一條線，即寫中國農民“現代主體意識”、階級意識確立的歷史，這使得《創業史》不是後來諸如《月亮灣的笑聲》、《李順大造屋》那種沒有精神深度的農民“發家史”。在後者中，農民被當作純粹的物質，1980年代以來的中國農村題材小說，均把農民當成了“物質的奴隸”——黑格爾說：奴隸不是人，因為奴隸的工作是勞動，奴隸的宿命就是改造物質世界；奴隸根本上屬於物質的世界，而非精神的世界。主人則是通過支配人、支配和管理“精神的世界”而間接地支配物。而《創業史》所要寫的“農民的歷史”，乃是作為“現代人”的中國農民的主體性形成和發展的歷史，通俗地說，就是“新人”、“新農民”成長和發展的歷史，《創業史》的創新，就是寫農民的“心靈史”、寫農民內在主體性形成的

過程。這種創新，首先就是不把農民寫成高大全，恰恰相反，作者一開始就揚棄了那種抽象的“公”，而是從農民的自私、動搖、自我矛盾、自我懷疑出發，一言以蔽之，柳青最高明的地方，是把農民的“不堅定性”——即農民的自我矛盾、自我懷疑，既看作農民的弱點，同時，更看作農民覺悟的動力。

關於自我懷疑和自我反思乃是農民精神主體性形成的動力，這方面認識最深刻的是被稱為“農民的王”的毛澤東。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中，毛澤東曾經如此感慨地寫到：“社會主義是這樣一個新事物，它的出生，是要經過同舊事物的嚴重鬥爭才能實現的。社會上的一部分人，在一個時期內，是那樣頑固地要走他們的老路。在另一個時期內，這些同樣的人又可以改變態度表示贊成新事物”——《創業史》扉頁上鄭重地引用了這段話，這引用並不是為了圖解、跟隨政治形勢，因為恰是這段話，表達了對於“精神的歷史”（精神現象學）的最為透闢、根本的理解。黑格爾說過：自我懷疑和自我反思，既不能說是一種弱點，也不能說是一種長處，因為它就是人類精神活動的基本方式。

《創業史》是一部中國農民的“精神現象學”（當然是文學化的）。它的主人公梁生寶，並非生來就是大公無私的高大全，從小說一開始，梁生寶追求的便不是純粹的精神和道德，與千百萬中國農民一樣，他追求的是物質、是發家致富、是置業創業，即他的出發點同樣是“私”，而不是抽象的“公”，當然，梁生寶最終還是達到了“公”，只不過，梁生寶的“公”是以“私”為起點和動力的“公”，是包納了“私”的“公”，這樣的“公”乃是千百萬組織起來的小農的“大私”的表述，正是在包納千百萬“小私”，而同時又揚棄抽象的“公”的過程中（這在梁生寶與“抽象的公”的代表者——郭振山的矛盾衝突中，有著突出的刻畫），梁生寶方才成為新的“公家

人”，他方才得到了廣大農民，特別是他的養父“梁三老漢”的支持、理解和認同。

與“文革”時代的作品如《金光大道》和《豔陽天》相比，《創業史》的重點不是寫階級鬥爭，而是寫農民的“創業”（這是它在“文革”中被批判的主要原因）。但是，在我看來，柳青卻是在更深入的意義上，去理解階級和階級鬥爭的。

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一方面，離開了物質生產活動，“階級”就不過是一個空洞的身份標籤，而另一方面，或者更為重要的方面則是：階級鬥爭並不等於簡單的“戰爭”，它並不是從肉體上消滅對手的那種粗暴的活動。在馬克思的意義上，階級鬥爭是“揚棄”，它的核心過程是“包納”，即不是簡單的消滅對方，而是在將對方包納進自身的同時，揚棄過去的“自我”，從而形成的新的主體。

《創業史》便是這個意義上的階級鬥爭史，而這樣的階級鬥爭史，同時便是階級主體包含式（即包納他者）的成長過程，所謂包納他者，也就是“在舊的事物中包含著新事物的萌芽”，同樣的，在新事物中又始終蘊含著舊事物“復辟的可能性”。即這種“包納式的揚棄”，並不會以一方完全克服、消滅、取代另一方而結束和告終，所謂“一個階級勝利了”，乃是指它將自己的對立面包容在自己的內部，“一個階級失敗了”，則是指它依然以新的形式繼續存在和寄生在新生的肌體中；當然，這並非是由於“階級鬥爭”進行的“不徹底”，而是說“揚棄”乃是人類歷史發展的一般方式。

只有從這樣的視野，才能理解所謂“階級陣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都存在著階級、階級鬥爭，都存在著資產階級復辟的可能性”——才能理解這種革命和階級鬥爭的辯證法。

如果喪失了自己的對立面，就不會有主體的運動，也就不會有歷

史，毛澤東說：“一切事物中都包含著它的對立面”，“到了共產主義，還是會有矛盾”。

在這個意義上，《創業史》，其實是一部比《金光大道》更深刻、更徹底的中國農村階級鬥爭史。

## （二）“寶娃”與“阿甘”：“雞毛上天”的可能性

《創業史》的主人公叫梁生寶，小名“寶娃”。而漢語中的所謂“寶”有兩個意思：一個寶貝，另一個則是“活寶”（即類似於“傻瓜”）。

梁生寶其實正是這樣一個雙面體：他是新農村千百萬中國新農民的代言人，同時，他性格中也有“傻瓜”或者“活寶”的一面。對於已經不熟悉 1950 年代中國歷史的當下年青讀者來說，《創業史》的故事，其實最類似於廣有影響的美國電影《阿甘正傳》（*Forrest Gump*），“寶娃”與“阿甘”的故事，其實屬於同一類型的現代小說敘事（“小上帝”或“小天使”敘事），這都是“雞毛可以上天”、弱者和小人物辦大事的故事，這兩部作品也都是通過一個小人物，來寫了一個時代，而這個時代就是所謂“現代”。

如果用最簡單地詞來解釋什麼是“現代性”，那麼我們可以說，所謂現代性也就是“可能性”（possibility）。它意味著不斷的自我創新、自我生產和再生產；通過自我創新，“我”才有可能成為一個不同的人，世界才有可能成為不同的世界，而“另外一種選擇，另外一種道路，一個新的世界，便永遠是可能的”。

而在 1500 年以降的歐洲，現代性這種“自我創新”的理念，是伴隨著迷漫全社會的精神和信仰危機、伴隨著宗教改革運動而確立的。加爾文（John Calvin）的著名論斷是：人的命運處於“雙重前定”

(double predestination) 中：即“個人的選擇”和“上帝的選擇”。人可以選擇，他可以選擇得救或者沉淪，但是人卻不能理解、代替上帝的選擇，因為上帝神秘的力量是人所不能達到的。上帝可以選擇善，也可以選擇惡，只不過那屬於神的意志。正是這一著名的“加爾文論斷”將人類的命運和“前定”相對化了，而這就意味著現代性的降臨伴隨的是“上帝(決定論)之死”，而人的自我創造成為可能：“從來就沒有救世主”，人們創造自己的歷史，歷史便不會終結。

從宗教改革運動中汲取了靈感的達爾文的“進化論”，把上帝和命運的青睞加之於“強者”，這裡的強者自然是新興的資產者，將達爾文的叢林法則移植到社會，資產者就成為了人類中“有天賦的強者”，這樣一來，上帝“看不見的手”也就只為強者(有權力和財富者)擲骰子，這意味著在“生存競爭”中強者一定會勝出，強者甚至就是上帝的化身。

但是，馬克思指出，如果說資產階級確乎有什麼特殊的“天賦”，這種天賦其實不過就是“創新”而已。馬克思說，資本家不是舊貴族舊地主，也不是商人和高利貸者，資本家是一種特殊的企業家和實業家，資本家是“生產者”，作為“生產者”，它除了對生產力和生產關係進行不懈的創新之外，沒有任何超出商人和高利貸者、超出歷史上的舊貴族和舊地主的“天賦”和“實力”，除了把生產和再生產當作價值之外，現代社會沒有任何其他的終極價值。而如果將無產階級的革命導師在《共產黨宣言》中對資產階級那段無與倫比的滔滔讚頌，歸結為一句簡明的話，那其實便是對於“創新”的讚美。

當然，馬克思和恩格斯最終還是把“創新”這頂最偉大的“現代天賦”桂冠加在了無產階級的頭上，恩格斯甚至認為：與資本家階級相比，無產階級作為生產者，乃是最徹底的企業家，因為無產階級連生產資料都沒有，所以，不斷創新和變革生產力，便是無產階級存在

的唯一理由、唯一目的。

實際上，馬基亞維利（Niccolo Machiavelli）早於馬克思提出了另外一種假說，以與達爾文建立在動物世界之上的“強者神話”相對立。他認為：如果我們回到宗教改革思想中所蘊涵的現代先聲，那麼恰恰是“弱者”和“窮人”才代表了路德和加爾文的“新上帝”——這個“現代意義上的上帝”，不過是一個不斷創造“新我”、“新人”和“新世界”的充滿“可能性”的主體，這個自我創造的主體，與窮人和弱者的形象類似。他說，正因為貧窮和受苦，現實中的弱者和窮人身上才充滿了自我更新和改變世界的不息的渴望和能量（ability to renew being），而相對來說，強者和富人則傾向於維護現狀。而“窮則思變”，正因為窮人和弱者命定的熱衷於自我更新和改變現狀，所以“弱者和窮人”比“強者和富人”就更容易傾向於創新和試驗，弱者比強者在心理上更“開放”：因為在試驗和創新的競爭中，弱者已經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喪失，他們失去的也許僅僅是鎖鏈而已，但對於擁有既得利益的強者來說，事情則不然。強者已經擁有一切，因此，他不需要、乃至反對“可能性”和不確定性。

“窮人更需要一個新世界”，“窮人”更需要一個新的自我。這也就是為什麼馬基亞維利會認為：在宗教改革之後的世界上，如同上帝一樣真正具有“預言能力”的恰恰是窮人和弱者，這不但因為貧窮是一種現狀，而且更因為貧窮意味著“改變現狀的可能性”。貧窮不但是世界本身，而且貧窮也是“改造世界的可能性”（not only is the poor in the world, but the poor itself is the very possibility of the world）。在這個意義上，路德和加爾文的上帝，其實就是一個窮人和弱者的上帝，甚至可以說：窮人就是“上帝在人間”（The poor is god on earth）。

也正是基於馬基亞維利對現代性的理解，現代小說中源遠流長的

“小人物”或者“小上帝”敘事傳統得以形成：這意味著這樣一種小說模式——上帝化妝來到“現代世界”，他扮演的其實是一個弱者和小人物，他以魔法和神奇和向我們昭示的“神跡”，也就是“雞毛上天”和小人物改天換地、作大事業的“可能性”。

為人們所熟悉的電影《阿甘正傳》的開頭，其實正是這樣的隱喻：一片雞毛飄然上天，飛到傻子阿甘手上。而主人公阿甘喃喃自語的開場白是：“媽媽說過，生活就是一盒巧克力，在打開之前你永遠不知道會遇上什麼。”

對於當代中國人來說，這個“雞毛上天”的意象更是別有深意：1955年9~12月，毛澤東親自編輯了長達95萬字的《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資料集，並為每一篇資料加了按語。在一篇題為〈誰說雞毛不能上天〉的文章前面，毛澤東這樣寫到：“富裕中農說：‘窮光蛋想辦合作社哩，沒有見過雞毛能上天。’雞毛居然上天去了，窮人要翻身了。舊制度要滅亡，新制度要出世了。”“‘雞毛不能上天’這個古代的真理，在社會主義時代，它已經不是真理了。”而《創業史》和梁生寶，就是產生在這個“雞毛可能上天”的時代。

Antonio Negri 睿智地寫到：“現代性是在拉伯雷的笑聲中降臨，帶著窮人飢餓的肚子至上的現實主義。”這句話意味著：現代世界的“小上帝們”自我更新、自我發展（翻身）的熱望，並非來自靈魂深處神靈的感召，並非是要充當推動“絕對精神”前進的工具，而完全是為他們咕咕叫的肚子所迫。人類因為匱乏不得不勞動，窮人因為貧困不得不生產，這就是“人性”之被動性的根本，而“我們想吃飯”和“雞毛要上天”這種鄙俗的要求，必然會伴隨著拉伯雷小說裡大人先生們嘲弄的笑聲：正如《創業史》第一章的開頭，富裕中農郭世富的新瓦房在人們羨慕的目光中平地而起，而梁生寶老弱病殘、飢腸轆轆的八戶互助組，卻在一片嘲笑中登臺。接下來，寶娃這個“阿



甘式的人物”，也正是在一片笑聲中，如落湯雞一般從瀟瀟春雨中向我們走來：頭上頂著塊麻袋片，身上扛著畝產 710 斤的新稻種。而在小說結尾，當富裕中農郭世富老漢在糧食自由市場上數著賣高價換來的幾十塊，以“龜兔賽跑”的預言嘲笑“寶娃這個寶貨”的時候，他萬萬沒有想到的是：渾身都是麻袋片，如丐幫領袖的梁生寶，此時正和老弱病殘鑽在終南山紮掃帚——而他從信用社裡領到的預付款就是 750 塊——而且是“嶄新的人民票”！

烏龜竟然爬過了兔子，而雞毛也就是在這樣一片哄笑聲中，竟然上天去了。

一張白紙，沒有圖畫。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畫最新最美的圖畫。強者有強者的弱點，而弱也有弱的優勢。美國人阿甘是個弱者，因為他弱智（IQ 只有 75），中國農民寶娃更是個弱者，因為他貧窮。兩部作品的開頭相似而又不同：童年的阿甘不敢下地，是因為他不會走路，童年寶娃不敢下地，則是因為他沒有褲子穿。然而，也正是因為弱智和貧窮，在有了自知之明的同時，他們也就沒有了、卸下了思想負擔——這就是寶娃常掛在嘴上的：“自己有什麼？全下堡鄉誰不知道咱乳名叫‘寶娃’，本來沒多大本領嘛！現在也並沒有丟人不丟人的問題”（小說第 357 頁）。沒有了思想負擔，這就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這其實也就是雞毛可以上天的第一步。

既然“沒有丟人不丟人的問題”，也就具備了常人所沒有的自信與從容，既然智商比別人短半截，因而笨鳥就必須先飛，“自助、互助者上天助之”——當阿甘為逃命被迫跌跌撞撞跑起來的時候，種地搞不過富裕中農的寶娃，也被迫去搞新稻種、去紮掃帚搞副業（時至今日，我們可以設想，如果寶娃也像富裕中農一樣迷信自家的二畝三分地，他就將更深地被“捆縛在土地上”）。於是，在 20 世紀的 50 年代，太平洋兩岸的這兩個傻小子，被自身條件所逼迫，就這樣不約

而同，從搖搖晃晃、步履蹣跚，到健步如飛，如風如電，在漫天風雨中他們跌到爬起，終於給我們留下了奔跑不止、不懈自我創造的“現代英雄”形象。

我想，這也許就是《創業史》中的寶娃與那個既得利益者郭振山的根本區別。既然寶娃本來就是大家嘲笑的對象，本來就是“喜劇人物”，所以他就沒有什麼面子問題。而郭振山作為土改中的“轟炸機”，卻從來就是威嚴和權力的象徵，結果，他害怕丟失的東西就太多太多，罈罈罐罐，哪一件都捨不得丟手。郭振山的“在黨”，那是因為黨是權力的象徵，郭振山羨慕富農，那是因為人家是財富的榜樣，郭振山愛當官，是因為官才是威嚴和面子的集合。但是，寶娃跟共產黨走，是因為共產黨憐貧惜孤，是因為共產黨“把屁股坐在了窮苦人一邊”，走社會主義道路，這對寶娃來說不是空洞的信仰，而完全是咕咕叫的肚子的選擇，——說到底，除了共產黨外，誰還會要他們這些老弱病殘孤呢？

現代性是對“新事物”的追求，現代性其實不過就是“可能性”，它宣告：從來就沒有救世主，而創造一個個不同的“寶娃”、阿甘，創造一個不同的新世界，全靠我們自己。

在人類認識的歷史上，中國共產黨人第一次提出了這樣的觀點：認識和掌握世界的基本方法，並不是真理和科學理論，而是以此為基礎和起點的“實踐”。而實踐就是“在犯錯和糾錯中探索”的認識機制。

而毛澤東說：“一定會有兩種前途，兩種可能性。”

這也就是說，在爭取勝利的可能性的同時，必須洞悉“失敗”同樣也是一種可能性。這當然意味著，社會主義這個新事物道路艱難，一定會遇到挫折，只有那些不怕挫折，不怕失敗，志向遠大者，才會絕處逢生。社會主義是窮人的事業，是勇敢無畏的小人物的事業。而

在另一些人看來，它卻不過是傻子們關於“雞毛上天”的幻想。——而這就是小說所蘊含的最深刻的“現代意識”。

### (三) “創業難”

打開 1960 年第一版《創業史》，映入眼簾的首先是三個字：“創業難”——柳青的感慨，當然也是屬於每個中國人的感慨。

1982 年，柳青的三個子女來到皇甫村，睹物思情，他們這樣寫到：

站在神禾原的崖畔上，我們凝望著巍峨壯麗的終南山，望著山下的蛤蟆灘，當年種上的白楊，參天挺立，稻田縱橫，滿目蒼翠。鎬河出了終南山，自東南來，到了原下，轉向西流。靠著神禾原，依著鎬河畔，從東向西座落著莊稼人的院子，這就是皇甫村。

村子中間的一個土峯上，原來有一座破舊的古廟——中宮寺，這就是我們的家。父親略加修葺，住了 14 年。眼前，中宮寺已經夷為平地。冬青石榴沒了，爸爸精心栽培的蘋果、梨、桃，碩果纍纍的葡萄，也沒了。他經營過的菜地荒蕪了，他原來工作和起居的地方，都塌掉了——地上長滿了野草。淚水禁不住流了下來，爸爸的音容笑貌又出現在眼前。……

在柳青的骨灰面前撒下熱淚的，本應該是所有高尚的人，而不僅僅是他的子女。然而，真實歷史和人事變遷，卻遠比房倒屋塌、物是人非要來的更加殘酷，以至於作為後之來者的我們今天重讀《創業史》，竟不知道從哪裡開始，正如今天重新面對柳青，我們一時竟不知從何說起。遠隔滾滾紅塵，對於這部今天的年青人也許會感到非常陌生的傑作，我們甚至不得不從一個看來最驚心動魄、最讓人揮之不去的部分開始我們的重讀。

在長達 505 頁的《創業史》第一部的中間部分（257~258 頁），作者精心安排了一場歷史預言般的轉折式對話，見慣了世事變遷的梁三老漢固執、突兀地追問生寶的“貼心人”盧明昌書記的一個問題：如果進終南山砍竹子、搞副業出了事故，你們是否會追究梁生寶的責任？如果互助組、合作社沒有辦成，或者辦起來之後最終還是頂不住壓力，散掉了，那麼梁生寶作為領頭人，是不是要進班房（“承擔刑事責任”）？當一項前無古人的事業受挫或者垮臺，梁生寶是否會成為替罪的羔羊？

正是站在今天的立場上去看，半個多世紀前小說裡的這段“關於梁生寶未來命運”的對話或者“打賭”，如同歌德筆下靡非斯特與浮士德的打賭一樣，讀來竟是如此令人驚訝不已：

“唉！”老漢嘆口氣，說，“人，只能往吉慶處思量嘛！萬一出了一出岔子，實在受不了。是他領得頭嘛，他坐班房，我們家裡人難受。”

盧明昌忍不住大笑，“看你說得啥？生寶為啥坐班房？出了事情，也是俺共產黨的事情，怎麼能叫生寶一個人坐班房呢？你不是說我們全姓共嗎？”

梁三老漢放下了心中的負擔，笑了。他站起來，說：“是這，我回呀！要是有三長兩短，你們黨裡頭高抬貴手。”

盧書記忍住笑，把老漢送出大門洞，攙著他下高臺階，說：

“你只管放心！啥事想不通，你尋我來，咱叔侄倆談敘！”

然而，半個多世紀的歷史，在梁三老漢農民式的“遠見”和盧書記的“只管放心”的“包票”之間，似乎給出的是一個奇妙而近乎殘酷的結論。而今天看來，《創業史》中的梁三老漢之所以引起了更多研究者的重視，還不完全是因為嚴家炎先生當年所說的：梁三老漢是“更真實的農民形象”，而是由於他始終是小說所預示的“現代性的

另一面”，他意味著另外一種“可能性”——“可能失敗”。

實際上，也正如《創業史》第二部描寫的，正因為“雞毛”是在中國這樣一個社會裡，而不是在“真空”中上天，寶娃“雞毛上天”的創業故事，首先也就不可能不觸動郭振山這樣的既得利益者，在郭世富們的眼睛裡，梁生寶固然代表了“雞毛上天”的空想，而在抽象的“公”的代表郭振山那裡，梁生寶的實踐卻是“大私”。於是，1964~1965 春節期間的“社教運動”中，梁生寶的原型王家斌，終於被小說中“轟炸機”郭振山的原型們“架上了樓”（即批鬥），理由是搞社隊企業就是衝擊糧食生產，而王家斌“賬目不清”。是社隊企業資金的捐獻者柳青緊急從北京的作協理事會上趕回來，才避免了“梁生寶”進班房的命運，王家斌得以僥倖“下樓”。（潘維的研究指出：1964 年底開始的農村“社教運動”是以保證糧食生產為目標的“現實主義”政策，對於毛澤東的農村工業化與合作化“激進政策”的反彈或反撥，皇甫鄉的情況某種程度上證實了潘的判斷。）

然而，文革爆發後一年的 1967 年春，陝西文聯的“造反作家”們將柳青揪到西安隔離批鬥，罪名就包括追查他“鉅額稿費”的去向。柳青夫人馬葳（她身上有小說女主人公改霞的影子）經不住壓力自殺身亡，——小說中的小延安“楊副書記”自身難保（柳青自己曾經掛職長安縣委副書記），從此他就再也不能給“梁生寶”撐腰、打包票了。

往事的確並不如煙。今天想來，對於中國發展道路的探索和對中國農民的深厚感情，是那樣深刻地牽動著新中國締造者們的良心。早在 1950 年，來自太行山深處的一封信，即中共長治地委書記王謙關於互助合作的來信，引發了毛澤東與其他中央領導同志之間的辯論，其根源恐怕就在於杜潤生後來所指出的：“劉少奇那時的設想是先國家工業化，後農村集體化。”“而毛主席認為資本主義發展初期有

過一個工廠手工業階段，即通過改變所有制，依靠分工、合作形成新的生產力。難道我們就不能把農民組織到合作社，依靠分工協作、統一經營，來提高生產力，動搖私有制？”<sup>6</sup> 歷史已經證明，少奇同志當時的選擇，是比較符合彼時中國現實的迫切要求的；不過更為重要的卻是，今天對於“城市發展起來，城市工業化完成之後，便會自動反哺農村”這個命題打上一個大問號的，也最有可能者便是少奇同志本人。而面對今天那樣一種剝奪農村謀發展乃是“普世價值”、“人間正道”的言論拍案而起（乃至要重上井岡山）的，也絕不僅僅是毛主席，少奇同志倘若在世，他同樣也會贊成這樣的觀點：問題的根源絕不在基層、絕不在農村，而就在“上層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少數當權派和政策制訂者”，而要解決中國農村發展的問題，靠整農村基層幹部，只能造成農村基層組織的瓦解，那才會造成不可收拾的階級鬥爭擴大化。因為對於郭振山這樣的既得利益者而言，階級鬥爭就是“從肉體上消滅自己的對立面”，革命就是為了奪權，說穿了也就是當“紅色地主”，而地主們的邏輯是相同的，那就是保證既得利益的穩定。郭振山這樣的“紅色地主”當然是既不會理解、更不會贊成什麼“互助合作”是所謂“制度創新”的，當然是不會贊成“互助合作”、“集體化”不是“大公無私”，而是“化私為公”的“揚棄式發展”的。郭振山式革命，就是魯迅所謂“從革命到革革命”。如果梁生寶的互助道路，乃是以包容互助、共同富裕，以協調農村尖銳矛盾的新型組織方式，那麼郭振山道路則代表了這種新的政治方式的瓦解，預示著中國農村以“階級鬥爭”的名義，重新走向弱肉強食、自相殘殺。也許正如一位當代的研究者（武春生）一語中的指出的：如果要反思歷史上的“動亂之源”，那麼最有代表性的並不是《芙蓉鎮》裡的王秋赦，而是《創業史》中的“轟炸機”郭振山。

---

<sup>6</sup> 《杜潤生自述：中國農村體制改革重大決策紀實》，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第 27 頁。

1982年，柳青去世四年後，與柳青同為“小延安”的《白毛女》的作者賀敬之來到皇甫鄉為柳青掃墓，親耳聆聽了梁生寶的原型王家斌談柳青和現實中艱難的“創業史”，感慨萬千之餘，詩人留下了這樣的詩句：“床前墓前恍如夢，家斌淚眼指影蹤，父老心中根千尺，春風到處說柳青”。——農民不能寫文章，在關於柳青的回憶和評論文字中，當然沒有一篇出自最有發言權的梁生寶的原型王家斌，而涉及到王家斌的，也只有賀敬之這詩中形象的一句。

1997年，皇甫鄉農民集體創業的帶頭人、創造了陝西水稻產量紀錄的勞動模範，當年的“梁生寶”——“皇甫鄉的傻瓜、好人”王家斌在孤獨中去世，據說臨終前他還在忙著為村裡打井、力圖恢復當年的集體企業——可惜“寶娃”的“二次創業”後繼無人，由於如今的年青人都已經奔馳在出外打工的道路上，村裡剩下的是“389961部隊”，據一篇感情真摯、題為〈尋找梁生寶〉的文章的描述——“當時天下著雨，村上沒有一個鄉親來送行，棺木是用拖拉機拉到墳地的。蛤蟆灘仍活著的當年一批共同創業者如今只剩下高增福的原型了。”王家斌的命運，讀來令人不勝唏噓。

其實，早在1983年5月，柳青的一位故交，在一首懷念詩作中，就發出了“尋找梁生寶”、“柳青魂兮歸來”的萬千感慨：“下堡淒涼，生寶潦倒，長使故人心折。魂夢難與君會，想忙與村中父老、畫長策。總算爭得了，莊上晚來春色！風暖稀釋秦嶺雲，魄歸應念鄜州月；情無限，意難說！”

此後凡11年風風雨雨，當“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再次成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讀書》雜誌2004年第6期發表的武春生的文章〈尋找梁生寶〉（文章的一個明顯不足之處，是將柳青夫人馬蕙名字誤作“馬原”），又一石激起千層浪，起碼使“知識界”的人們，重新想起了柳青和《創業史》，想起了王家斌和梁生寶。而對於知識

界、特別是文學界來說，一個更為切膚的問題或許應該是：我們究竟是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失去了柳青，我們又是在什麼意義上與梁生寶擦肩而過的？正是這個問題決定了我們今天要到哪裡去“尋找梁生寶”，——而且，恐怕還不僅僅是“尋找梁生寶”，而是在當代中國的社會條件下，為了探索科學發展之路，為了和諧社會的遠景，我們甚至必須像當年的柳青那樣，在風暴來臨的時候挺身而出“保衛梁生寶”。

——還是讓我們用另外一個“寶娃”的故事，來繼續對“失去的”梁生寶的尋找吧！因為這是一個與柳青的《創業史》相同、但又不同的故事。

1929年，另一個中國“寶娃”出生在江陰一個貧農家庭，他的名字叫吳仁寶。14歲時的一場大饑荒，寶娃的父母不得不把他的弟弟賣了，為的是換了幾個活命錢。吳仁寶的故事與《創業史》題序中的描寫完全相同，是20世紀前半葉中國農村數不清的悲慘故事中的一個。而從此後，吳仁寶就鐵心跟共產黨走，成為當地土改的帶頭人。1952年，——這也就是王家斌互助組成立的那一年，吳仁寶領著全村最窮的13戶人家成立了當地第一個“互助合作組”。1953年吳仁寶入黨並當上了村長，自1957年華西村成立黨支部以來，他就一直擔任黨支部書記。

正像梁生寶一樣，1960年代的吳仁寶帶領全村平整了土地，創出畝產一千斤的全國紀錄。華西村也有自己的“徐改霞”和“素芳”，華西女勞模的名字叫趙毛妹。1970年代，華西村辦起了社隊企業（比皇甫鄉還晚），但是華西的社隊企業卻一直頂風冒雨堅持下來，沒有垮掉。而到1985年，在全國農村收入開始下降的時刻，華西村集體企業的產值首次達到一個億。1950年的華西村，是當地最窮的村子，而如今戶均收入22萬美元的華西村，卻是中國農村的一



個奇蹟、一面不倒的紅旗，是“中國第一村”。

像許許多多從中國泥土裡湧現出的梁生寶一樣，吳仁寶和華西村的故事，給了柳青的《創業史》另外一種結尾的“可能性”，也給了我們另外一種歷史的結論，這個結論也許就是吳仁寶這個樸實的農民所說的：“集體經濟救華西，社會主義救中國”。

“咱們的天，咱們的地，咱們的鋤頭咱們犁。窮幫窮種上咱們的地，窮幫窮走咱們的社會主義。”探索一條團結互助的中國農村發展道路，這是幾代中國人的堅定意志與不可動搖的信念。中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如果沒有糧食增產和豐收，連吃飯都談不上，談何發展；而僅僅依靠種糧食，農民卻不可能增收致富，甚至難以脫貧。對於那些主張將糧食生產交給市場、乃至“國外糧食市場”的“郭世富的子孫們”來說，他們或許根本不懂得增產不增收，穀賤傷農的道理，他們也可能完全不懂得單純地依靠變化莫測的“國際市場”，會給農民帶來怎樣的滅頂之災，會給 13 億中國人的生存帶來怎樣的滅頂之災。

同樣的，對於中國來說，不搞現代化、不搞工業化、不搞市場經濟，就不能發展，從根本上說也就沒有出路。但是，在現代化和市場化的過程中，如果不保護弱勢群體，扶助老弱病殘孤，而是聽任他們被毫無保障地被拋入工業化、市場化的波濤洶湧中，那麼工業化、市場化就不可能搞成功，——如果說工業化、市場化就必須以犧牲窮人、犧牲農民、犧牲老弱病殘孤為代價，那麼，我們還要中國革命幹什麼？還要馬克思主義幹什麼？還要共產黨人幹什麼呢？

“燕山高又高，清泉石上流。群雁高飛頭雁領，書記帶頭向前走。”社會主義是這樣一個新事物，它是夾縫求生，逆風起飛。在中國農村這樣人口很多、資源很少的環境中，之所以需要梁生寶這樣沒有私心的“傻瓜”，需要許許多多的“寶娃”把窮哥們團結起來，帶

領大家走互助合作道路，以揚棄式、包容式發展方式代替殘酷的鬥爭，這甚至還不僅僅是為了中國農村的“發展”，而首先乃是為了維持中國農民的生存。或者說，為了避免農民彼此間圍繞著有限的資源進行的自相殘殺這種可見的結果。而這也就是毛主席 1959 年對吳旭君所作的如此令人心傷、又如此使人奮起的自我剖白：“我沒有私心，我想到中國的老百姓受苦受難，他們是想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眾，我現在還活著呢，怎麼有人就這樣！——建立新中國死了多少人？有誰想認真過這個問題？我是想過這個問題的。”<sup>7</sup>

組織起來，走集體創業、共同富裕的道路，團結起來，去爭取勝利；以農業產業化和農村工業化的形式去應對城市工業化和市場化的挑戰，這就是幾億中國農民的偉大創造，是幾代中國革命者集體智慧的結晶。“洞庭波湧連天雪，長島人歌動地詩。我欲因之夢寥廓，芙蓉國裡盡朝輝。”我們今天難道不更需要這樣的想像力，難道不是更需要為這樣的“可能性”而不懈奮鬥下去嗎？

是啊——無論多麼幼稚、無論多麼不成熟，無論世事多麼艱難、道路多麼難以平衡和容易摔跤，我們的前人，不正是這樣步履蹣跚，披荆斬棘，頂風冒雨，一步步地向我們走來的嗎？

一個年青莊稼人，頭上頂著一條麻袋，身上披著一條麻袋，一隻胳膊抱著麻袋包著的鋪蓋卷，出現在渭河上游的黃土高岸上了。在雨裡帶雪的春寒中，他走得滿身是汗。因為道路泥滑，他得全身使勁，保持平衡，才不至於摔跤。

春雨又下起來了，晰晰瀉瀉地……

“紅雨隨心翻作浪，青山著意化為橋”，我們的主人公梁生寶，

---

<sup>7</sup> 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3 年，第 1390 頁。

正是這樣肩扛稻種在瀟瀟春雨中向我們走來的。今天，我們是舉起雙手歡呼他，還是搖唇鼓舌批判他呢？是為他的重生和復活搖旗吶喊，還是為他的“死亡”感傷懷舊、乃至幸災樂禍呢？是站在他們頭上指手畫腳，說什麼農民素質差，人口數量多，中國農村乃至中國“根本無辦法”，還是匯入他們之中去，為爭取“雞毛上天”的可能性去盡一把綿薄之力呢？

而這就是擺在今天我們每一個人面前的課題，這也就是我們重讀《創業史》的當下意義所在。

## 附：劉可風同志來信

毓海同志：

一直想給您去信，但不知道怎樣說起、如何說起。

從報刊上讀到您寫的〈春風到處說柳青〉一文，我流了淚。感謝您對家父、對《創業史》的理解，更感謝您對家父的感情，家父要是還在世，能讀到您的這篇文章，他老人家該是多麼高興啊！

家父把一萬六千多塊的錢的稿費，全部捐給了王曲衛生院、捐給了社裡搞工廠，我結婚的時候，家父也沒有給我一分錢，而是給我寫了一幅字。正如您所說，《創業史》是中國農民的精神史，家父不在了，歷史在繼續，不管怎麼樣，還是要有人為農民寫歷史的。

我寫信是為了向您說明一個重要的事實，就是關於家斌叔的喪事。這些年來，出於各種目的（其中也有好意的），都說家斌叔去世的時候，沒有一個人來送葬，孤苦伶仃的。這是不對的。真實的情況

是：家斌叔下葬的時候，有上千人自發來給他送行，其中，建國後長安縣的 11 位中國共產黨的縣委書記全都來了。

家斌叔是個農民，但是，他這樣一個農民，在人民群眾的心中是很重、很重的。

一個人只要是真心為人民服務的，是為人民作了點事的，他的死便重於泰山。

附上我發表在《西安晚報》上的文章，記述了當時葬禮的情況，請你參考，並請您告訴大家，告訴後人，告訴北京大學的同學們。

也算是請您為家父再作一件事吧。

祝您工作順利！

劉可風

2006 年 11 月 4 日